

# 近代中国西学观的辩证发展

冯君

(嘉应学院政法系, 广东 梅州 514015)

**[摘要]** 近代中国西学观大致经历了朴素的西学理论萌生、初步实践和发展、进一步完善与全面实施三个发展阶段。在此发展过程中,西学的范围有所扩大,西学的主体以及对象发生了变化,国人对西学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关键词]** 近代中国 西学观 西学理论 辩证发展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917(2010)04-0085-04

西学是近代中国不能回避的敏感话题,西学观是近代中国对西方认识、了解的集中反映,同时也是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史、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科学技术史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近代中国西学观的辩证发展,是中华民族付出沉重的代价、经过艰辛的探索得来的,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近代中国西学观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是朴素西学理论在中国的萌生阶段,以林则徐、魏源等人为代表,其中以《海国图志》为典型。第二阶段从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是西学理论在中国的初步实践和发展阶段,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郑观应、冯桂芬、洪仁玕等为代表。第三阶段从《马关条约》的签订至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是西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与全面实施阶段,以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等人为代表。

## 一、朴素西学理论的萌生阶段

明清时期,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宗教的同时,也介绍了大量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及科学技术成就,包括天文、历法、地理学、数学、物理、工程学、

火炮制造等。但当时中国主流社会对西学的态度始终是居高临下,或者认为西学源自中国,或者认为除极少部分可取之外,西学没有实际价值。西学始终没有改变其“奇技淫巧”的地位,如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在《思问录外篇》中认为:“盖西夷之可取者,唯远近测法一术,其他则皆剽袭中国之绪余,而无道理之可守也。”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爆发前都没有改变。即使是主张严禁鸦片、开明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林则徐,对西方的认识也是较为肤浅和片面的。1839年,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认为:“夫震于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以其奢靡挥霍而艳其富。不知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是以货船进口,亦必以重赏请土人导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从前律劳卑冒昧一进虎门,旋即惊吓破胆,回澳身死,是其明证。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非不可制也。”<sup>[1]</sup>鸦片战争已经开战在即,而以道光皇帝为首的封建官僚集团对西方的认识仍非常肤浅和片面,甚至可以说,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对西方世界的认识都是知之甚少甚至是一无所知。

**[收稿日期]** 2009-11-26

**[作者简介]** 冯君(1966-),女,四川广安人,嘉应学院政法系副教授。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近代中国社会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同时,思想领域内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在封建的士大夫集团中,有少数进步思想家开始从“天朝上国”的梦境中清醒过来,敢于正视现实,承认落后和技不如人,并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政治主张,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林则徐、魏源等人。鸦片战争失败后,顽固派仍然不承认落后,斥西方先进技术为“奇技淫巧”。针对顽固派的攻击,魏源认为:“有用之物,即奇器而非淫巧”。在1846年编著的《海国图志》中,魏源明确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魏源认为:“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之长技。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sup>[2]</sup>这成为其后洋务运动的主要理论依据。以魏源为代表的中国地主阶级中的少数开明知识分子,痛定思痛,已经开始承认“天朝上国”的清王朝存在许多技不如“西夷”之处,他们已经知道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寻找先进东西来挽救国家民族危机,抵抗外来侵略。当然,这一时期的西学观是朦胧的、比较肤浅的,即夷之长技主要都是与军事工业有关,而对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的巨大优势,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尽管如此,他们已经能够认识到中国的不足和落后,而且已经有了向西方学习先进军事技术和其他近代科学技术的意识和强烈愿望,这本身就是巨大的进步。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标志着中国近代朴素的西学理论的萌生,为中国人民探索近代中国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新的内容和指明了方向,对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体现了他的科学求实精神,同时也是他的学习原则。“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用其人”<sup>[3]</sup>。这已成为当时洋务派及社会有识之士的共识。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sup>[4]</sup>当时,中国社会对西方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科学技术的需求成为洋务运动开展的巨大动力。

以洪秀全、冯云山为代表的中国农民阶级,也同样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社会的危机和困惑,急切想从西方寻找中国救亡发展的方案,但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洪秀全借用了西方基督教的宗教外形,并与我国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相结合,创立了拜上帝教,

农民阶级也提出了本阶级的西学观,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 二、西学理论的初步实践和发展阶段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及其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及科学技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861年8月,曾国藩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赞成奕訢等要求购买外洋船炮的主张是当时救时之第一要务,“凡恃己之所有,夸人之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sup>[5]</sup>。李鸿章认为:“臣查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夺其所恃。”<sup>[6]</sup>“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弓矛、小枪、土炮,不敌彼后门进子来复枪炮;向用之帆篷舟楫、艇船炮划,不敌彼轮机兵船,是以受制于人。……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耳。”<sup>[7]</sup>“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之所以富强,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弊者。”<sup>[8]</sup>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对西方的认识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方面,尤其对西方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印象深刻。如洋务派最有成效者李鸿章甚至认为,西学的优势仅在科学技术层面。“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sup>[9]</sup>

同时,基于对西学的认识,以及借助地方实力派的力量和与西方列强建立起的“亲密”关系,洋务派把中国近代西学理论付诸实施,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成为中国近代西学理论的最早实践者,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在实践基础上,西学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此,近代中国西学观的发展进入西学理论的初步实践和发展阶段。这一时期,西学内容与理论都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涌现出一批西学理论家和

思想家。如冯桂芬,他在《制洋器议》篇中明确指出中国在四个方面不如夷人:“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sup>[10]</sup>因此,他认为:除坚船利炮之外,“至西人之所擅长者,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sup>[11]</sup>。这一时期,西学理论的杰出代表和集大成者当数郑观应,他在《盛世危言》中对西学进行更加详细的介绍和分类。他认为西方学校教育包括:“一经学、二法学、三智学、四医学。经学者,教中之学,即是耶稣、天主之类;法学,考古今政事利弊异同,及奉使外国,修辞通商,有关国例之事;智学者,格物性理文字语言之类;医学者,统核全身内外诸部位,经络表里用病源,制配药品,胎产接生诸法。技艺院者,汽机、电报、采矿、陶冶、制炼、织造等事。格物学院与技艺院略同,大抵多原于数学,数学则以几何原本为宗,其次力学,力学者,考究各物之力量。化学者,核金石、植物、胎卵、湿化各物化生之理,其次为天学、测步、五星、七政之交会伏留,其次为航海之学必娴于地理、测量、驾驶者,方能知船行何度,水性何宜,台飓沙礁若何趋避。武学院课与实学院同,但多武艺、兵法、御马诸务。通商院则以数学、银行、文字三者为宗,其于各国方言土产,水路陆程,税则和约,以及钱币银单,条规则例,公司保险各事,无不传习。农政院、丹表院、律乐院、师道院、宣道院、女学院、训警院、训聋暗院、训孤子院、训罪童院、养废疾院,更有文会、夜学、印书会、新闻馆、别有大书院九处,书籍甚富,听人观览借钞,但不能携之出院,每岁发国帑以贍生徒,其教法之详,教思之广如此。”<sup>[12]</sup>郑观应对西学进行了较完整的介绍,同时,他还对洋务运动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今中国既设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各堂,历有年所,而诸学尚未深通制造,率仗西匠,未闻有别出心裁,创一奇器者,技艺未专,而授受之道未得也。诚能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晰,译出华文,颁行天下各书院,俾人人得而学之,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材之众,竭其聪明才力,何难驾西人而上之哉!”<sup>[13]</sup>

在这一段时期,代表农民利益的知识分子也提出了自己的西学理论和西学纲领,最典型的就是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洪仁玕作为中国近代农民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他已经开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纲领,试图把资本主义的先进思想和当时中国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用一种

超越传统的、先进的思想来指导当时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洪仁玕主张向西方学习,他对西方的认识真实而且深刻,他的西学理论已经大大超过魏源,也超越了同时期农民阶级的其他政治家和思想家,处于时代的最前列。

### 三、西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与全面实施阶段

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中国近代轰轰烈烈 30 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社会各阶层都在进行认真反思,特别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洋务运动进行了认真、深刻的反思。如梁启超认为:“中国向来守旧之徒,自尊自大,鄙夷泰西为狄者无论矣,即有一二号称通达时务之人如李鸿章、张之洞之流,亦谓西法之当讲者,仅在兵而已,仅在外交而已,曾无一人以蓄养民力,整顿内治为要务者,此所谓不务本而欲齐其末。故虽日日言新法,而曾不见新法之效也。而彼辈病根之所在,由于不以民为重,其一切法制,皆务压制其民,故不肯注意于内治,盖因欲兴内治,不能不稍伸民权也。观于湖南之事,乃知陈宝箴、黄遵宪等之见识,远过李鸿章、张之洞万万矣。”<sup>[14]</sup>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一文认为,洋务运动时期,人们对西学的认识比较肤浅:“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sup>[15]</sup>在《读西书法》一文中,梁启超曾这样评价洋务运动时译著的水平:“中国译出各西书,半皆彼中二十年前之著作,西人政学日出月新,新者出而旧者废,然则当时所译虽有善本,至今亦率为彼所吐弃矣。惟算学一门,西人之法无更新于微积者,而当时笔受诸君又皆精于此学,不让彼中人士,故西书中以算学为最良也。”<sup>[16]</sup>谭嗣同 1898 年在南学会的讲义中提出了“学问救国”的主张,强调科学技术与国家兴亡发达有密切的关系。“鄙人深愿诸君都讲究学问,则我国亦必赖以不亡。所谓学问者,政治、法律、农、矿、工、商、医、兵、声、光、化、电、图、算皆是也。”<sup>[17]</sup>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选择了资产阶级维新改良主义思想,并实施了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运动。从 1898 年 6 月 11 日到 9 月 21 日,清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法令。在政治上,提出了兴民权、开

议院、君民共主等,要求新兴资产阶级参与国家政权,变封建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在经济上,主张以商立国,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设立农工商总局,提倡私人兴办近代企业,奖励发明创造,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资源,改革财政等;在文化教育方面,废除八股,变科举,提倡西学,建立近代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等。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主张全面向西方学习,全方位发展资本主义,虽然没有成功,但对中国近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较完整、科学的西学观,西学已经完全合法化,并成为时代潮流,许多知识分子为了追求国家富强之策,远渡重洋,到日本、欧美等国留学,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

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选择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提出了更加科学、合理的“三民主义”纲领,西学理论进入进一步完善与全面实施阶段。此时,中国近代社会也进入新的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

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中国社会各阶层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继续进行不懈的追求和探索,在茫茫的西方理论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逐步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

总之,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西学理论进入进一步完善与全面实施阶段,中国学习西方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第一,西学的范围扩大,由以前只注重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学习转变为全面的学习,也开始甚至更加注重思想、文化、制度的学习。第二,西学的对象发生变化,由以前以欧美为主变为以日本为主,后来逐渐转为向苏俄学习。第三,西学的态度发生根本变化,由居高临下、被迫学习变成虚心、主动的学习。第四,西学的主体发生变化,由政府的强制行为变成民间甚至全社会自觉的行为;各阶级、阶层及其代表人士从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目标出发,各自选择不同的学习内容和学习重点,整个中华民族都行动起来,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

## [参考文献]

- [1]林则徐等.英虽富强非不可制片[A].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八[Q].
- [2]魏源.海国图志:卷二[M].长沙:岳麓书社,1998:26
- [3]李鸿章.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折附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A].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Q].
-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Q].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05.
- [5]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225.
- [6]李鸿章.京营官弁习制西洋火器渐有成效折[A].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七[Q].
- [7]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A].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十九[Q].
- [8]李鸿章.复 稚璜宫保[A].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六[Q].
- [9][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M].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99.
- [10][11][12][13]郑观应.盛世危言[A].杨家骆.中国近代史文献汇编之一。戊戌变法文献汇编:第一册[Q].台北:鼎文书局,1972:130,38,46,47.
- [14]梁启超.戊戌政变记[A].杨家骆.中国近代史文献汇编之一。戊戌变法文献汇编:第一册[Q].台北:鼎文书局,1972:303.
- [1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A].杨家骆.中国近代史文献汇编之一。戊戌变法文献汇编:第一册[Q].台北:鼎文书局,1972:442.
- [16]梁启超.西学书目表[A].杨家骆.中国近代史文献汇编之一。戊戌变法文献汇编:第一册[Q].台北:鼎文书局,1972:447.
- [17]谭嗣同全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403.

[责任编辑:黎伟盛]